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人禍天災的再認識與社群實力的再生成

On Understanding Man-made Catastrophes and Re-generating Communal Capacities

doi:10.29816/TARQSS.201112.0008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5), 2011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5), 2011

作者/Author : 丘延亮(Fred Y. L. Chiu)

頁數/Page : 317-35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1/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816/TARQSS.201112.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第八十五期 | 2011年12月 | 頁317-352

人禍天災的再認識與社群實力的再生成
丘延亮*

On Understanding Man-made Catastrophes and
Re-generating Communal Capacities

by Fred Y. L. CHIU

關鍵字：自然災難、人為禍患、風險社會、殖民主義、在地知識、原住民

Keywords: natural disasters, man-made catastrophes, risk society, colonialism, local knowledge,
Primordial Inhabitants

* 服務單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通訊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E-mail: fredchiu@gate.sinica.edu.tw

摘要

自古，原住民向來和大自然緊密互動，與大地相依存，而在創造性的適應過程裡維持生計、創發文化；現代觀點的「天災」對他們而言，實是自然循環的一部分，在古老文化智慧下，往往能避災減損，繼續讓部落活出來。但今日世界的「災難」頻仍，往往被說成全球環境變遷下的天災，卻忽視「天災的人禍性」之歷史事證。因此，我們有必要藉不同主體對「災難經驗」的實際感知，進行問題與討論；重新釐析天災與人禍交織的辯證課題，並把「天災的人禍性」置於災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脈絡，重讀世界性的殖民主義擴張歷史，以期更看清國家、資本、慈善機構等在「災後重建」過程可能的同謀關係，並期能回歸原住民生活主體性和祛殖民主義的角度，重新提問。

Abstract

Upon reviewing thousands of entries of reportages dispatched from affected areas of the 921 earthquake as well 88 flood on their aftermaths, this paper purport to enquire into the “man-made catastrophic” aspects of these said “natural disaster”. It is found that the Modernist’s discourses on “risk society” and its collateral strategies of disaster-relief do not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rimordial Inhabitants in these areas at all.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understand those “man-made aspects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light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imordial Inhabitants’ ways in re-generating their communal capacities to re-build their lives.

airiti

一、問題意識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全球大氣暖化聲中，奪人眼目的是世界性傳訊螢幕中經常歷歷如繪的不堪與不幸景象。九一一攻擊每年重複播送的大特寫，瞬時將人們貼身到週遭隨時恐懼殺身洞的邊緣，地動或天雨都可以是你我明日變成災民或難民的預告。人們似乎忘卻了免於恐懼的生活是什麼一種日子，不受脅於匱乏又是怎麼一種逝去的嚮往與奢侈！

我們被告知說地球村進入了災衍週期，在無數個已開發國家首腦會議（如G8）、N個國族間交相推諉或指摘聲中，這一切都顯得很「希臘悲劇」式的人性命定論，某種自然規律的、無由迴避或無庸抗爭的宿命。

我們又被教育了去用新的警句片語來括限對生命的想像、對人類作為一個種屬及其存有時空的理解：十九、二十世紀的盲目樂觀化為烏有，換上了對「災難世紀」、「風險社會」及「全球危機」的茫然焦躁與恐慌猜疑。「人定勝天」的摩登人（Modernman）一夕間變成了「人為天譴」的準受害者，只能聽「自然」擺布或待人拯救！不然，就只有在自責、自怨的無告中淪喪！

何以過往一再否定或否認「危機」存在及其可能的既得利益者，瞬間變臉，成為「危機」的廣播員或傳教士？國族與資本的CEO一族，搖身一變扮成了人類未來的關懷者或整體長期利益的策士或國師？他們竟好像忘了在他們搖起左臂疾呼之際，他們的右手刻正變本加厲地在製造更多、更大的人禍危機呢？這些策士或國師的左手，不正恰恰是用來掩護其右邊上下其手的魔術道具嗎！？

而在受規訓了的年代裡，世界範圍的生計者彷彿漸被不分畛域的「危機政治學」操弄；被標籤上了「受害者」與「被污名者」的稱號；更被迫在無言中飲鳩內化、向它「認同」！

是以，我們有必要藉不同主體對「災難經驗」的實際感知，重新釐析天災與人禍交織的辯證課題，並把「天災的人禍性」置於災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脈絡，重讀世界性的殖民主義擴張歷史，以期更看清國家、資本、慈善機構等在「災後重建」過程可能的同謀關係，並以回歸原住民生活主體性和祛殖民主義的角度重新提問。

二、從九二一到八八：天災的認識與人禍的感知

回到在地的現實，九二一地震和八八水災給台灣帶來嚴峻的提問；古語「苛政猛於虎」的隱喻，在上位者災後救難的缺失及事後重建的專斷中，預告了關於人禍的新解釋與表達。

九二一後風起雲湧的社造風潮，在它時屆十年之際，時任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的陳錦煌發表了他題為〈社造十年 草根力量漸失〉的回顧談話¹，其實他指控的只是比較表面的「結果」。複雜的過程與病灶，當年的《九二一民報》早有深入的報導及尖銳的評析；政府機關單位在三叉坑、中原口的無所作為，更因各項重建不力與延宕，被監察院糾正。²而仁愛鄉瑞岩部落遷村等相關弊案，更讓好幾個鄉長被送法辦，遷村案在地震12年後的今日，仍尚未落成！

相反地，少數重建與部落再生成的成功案例，多是民間自主團隊長期與各級政府及其行政干擾進行抵制與抗爭的結果，其中最顯著的事例當屬日月潭邵族家園的自立自為；它們十幾年中不知經過多少千鈞一髮的危殆，在千辛萬苦的隱忍和堅持下，才有了今日部族重生的歷程。這些原住民部落自主重建的點點滴滴，當年替現災區原住民心聲的《原聲報》（已停刊）中有不少記載，今天則成回顧的史料或註腳。

1 見發表於2005年4月20日《聯合報》A11版的報導文章。

2 請參見監察院，中華民國九十年12月25日／（九十）院台內字第90一九〇〇八一八號對主管機關之糾正文。資料來源：《監察院公報》第2394期，頁5-24。

無可諱言地，十年來民間對災前災後各種人為因素的體認，已提升到意識與論詰的層面。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地方對「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的質疑與反抗，及八八災後小林村有491人屍首難尋的「滅村」及台南縣的28人「失蹤」，一連串激烈爭議與抗爭，卒至逼使政府匆促宣布越域引水工程「暫時停止」。

回顧八八，有諸多事證都彰顯了無能政府³、慈善暴力⁴和禿鷹資本的排山倒海「搶救」行動中，災區（尤其原住民地區）和災民再次成為魚肉，被放上任人宰割的刀俎。行政官僚體系散漫、聖氣凌人的NPO傲慢、見獵心喜的資本橫蠻出籠，不斷在災民身上進行二次、三次傷害。

上面三股以「慈善」面目出現的「硬」實力，在對災難進行介入與施展時，其頤指氣使的架勢，及「白種人職尚」式的管理主義自詡與強售，其遠離《金剛經》中「行布施、不住相」之訓誨何其遙遠？其自我本質化（也本質化受施萬眾）的施為，何能在以外力之姿欺身強入的競賽中，回歸以災區與災民為主體？何能以繼絕存亡、濟弱扶傾為本，踐行隨緣隨適隨眾生相？其「善心」是成就善事，還是自添事功？其「善行」是妄續人間疾苦，還是普渡眾生？

以上這些來自災區的不滿與質疑，我們的政府官僚、慈善家或資本主聽到了嗎？他們會不會對自己「二桃殺三士」的分化社群作為有所收斂呢？

答案恐怕是不會的。

究其實，八八災害兩週後，時為行政院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南部辦公室副執行長、「重建」的主要推手陳振川8月25日在陸軍八軍團指揮部記者會中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經建會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3 災後政府被批評「救災慢、重建急、立法草率」報導不少，相關評論也可參見陳永龍（2009.08.27），〈「災害重建」變「災害重見」〉。《蘋果日報》。

4 在「莫拉克獨立新聞網」(www.88news.org)上有相當多呈現原住民災民心聲、抱怨慈善機構的寫實報導。

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興工程顧問社、災後家園重建協會等四個單位聯繫，日後將相關調查資料納入國土保安與災後重建綱領，以整體力量解決各項問題，讓資源發揮最高效能。」⁵（中央社，2009/08/25）

這「四大團體」中尤其以「災後家園重建協會」最令人匪夷所思。它不但是「非法」的「黑」組織（它在2008年成立、名為「台灣工程界協助川震重建家園協會」），現在借屍還魂時名字上拿掉了台灣工程界，也隱晦了「協助川震」，是想幹些甚麼好事呢？如它是應政府之邀從事做「裁判員」的角色，它成員中的所有會員廠商在「利益迴避」原則下，當然理應被排除在日後競標救災工程的合格名單之外不是嗎？它們能同時身兼球員，進行「完美利益輸送」嗎？受災民眾能不對它心生警覺，能不同時將反「利益輸送」堅持到底嗎？

其次，財大氣粗的慈善團體恐有趁人之危，挾「善款」為武器，獨斷獨行，執意決斷災民未來命運之嫌。但「善款」從哪來的呢？不是社會大眾無私捐輸的嗎？！這些錢怎變成NPO機構的資產及實力呢？若沒有風災、災區、災民，這些捐輸會如甘霖般從天而降到這些慈善機構財庫中嗎？這些機構其財庫既非公務機關，難道真屬私人企業嗎？它們不受公共監督，不必傾聽民意、毋須對公眾、捐輸者及社會有所問責嗎？難道它們可以「正義」到憑它們（或之中少數人）的「心證」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與「操弄」嗎？

尤有甚者，最明顯的謬論就是意欲使原住民撤離傳統領域，接受永久「安置」的主張。在保護「生態」的抽象說辭下，最理想的是教他們「靈魂在山」、而肉身去當「巡山員」！⁶當然，這樣的主張是可議的。

何日生先生所代言的機構，每天由他宣示它的全球業績和完整體

5 大紀元8月25日報導(2009. 8. 25)，〈災區重建 台政院：納入四大團體調查結論〉。《大紀元時報》，[Online] Available: <http://www.epochtimes.com/b5/9/8/25/n2635577p.htm> (2010/12/2 瀏覽)。

6 何日生(2009. 9. 2)，〈讓祖靈土地安養生息〉，《聯合報》。

系的「助人」專業與「效率」。它們這麼驕人的成就——矢志「救苦救難」的企業化、私營化及寡頭化——成就了什麼人呢？它所服務了的「受助者」有一天可以變回普通的人，而脫離其「受害化」、「污名化」的二度傷害嗎？其「效率」是增加了這個脫離的可能與速度，還是延遲了其間的種種可能呢？

何日生先生所服務機構的壯大又意味了什麼呢？是因為有「為德不卒」的剩餘嗎？是作為社會財富再分配中介的運轉手有利可圖，還是行政超頭(overhead)的積累及「善用」呢？在「善款」與「善行」之間，其辯證與互動機制又是甚麼呢？會不會是一種惡性循環呢？善款既來就必須消化、消化善款就必須持續勸募，事功建鑄、業造疊來，是不是也是一種十道輪迴呢？

事實上，慈濟當局對上述機制與疑慮，並非全然無感或無知。八八災後慈濟曾被媒體質疑，隨後立即搶先向新聞界發佈要到中研院民族所請益；發言人何日生在2009年8月25日下午率團到民族所為「建大愛村進行說明」，會中民族所研究人員皆各本專業給予慎重為是的忠告⁷，並邀請其參加民族所即將在9月1日辦理的「氣候變遷、國土保育與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願景：八八風災後的前瞻性跨學科研討會」⁸。可惜會上和會後皆未見慈濟單位露面或回應，也始終未見任何中央或地方重建官員的留意或諮詢⁹。

而在八八災難滿月的五天後，9月13日由時任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王增勇教授策劃「體檢原鄉部落的災後重建：當原住民遇見大政府與大慈善」的台社論壇，主題有二：「在家屋重建政策中消失的

7 見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發行之《人類學視界》第三期「莫拉克風災反省系列之一」蔣斌的〈災難就責與歸因〉一文，以及郭佩宜發表於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八八水災重建論壇」的「組合屋及遷村相關」的談話；影像方面可參看Youtube慈濟為建村到中研院民族所說明(丘延亮回應部分)。

8 相關議程及會議記錄請參見：<http://ianthro.tw/group/88disaster/p/5736>。

9 見中研院民族所官方網頁。

部落主體性」和「無法穿透的重建決策機制：被專業與官僚消音的原住民主體」。這樣的討論已經聚焦到災難的「公共性」及其社會性／人群性的側面。

八八一週年，2010年8月11、12及13日，在台灣師範大學更舉辦了「一年過後：原住民災後重建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指出(一)從殖民的角度來看，原住民的比例越來越少；(二)藉公權力配合慈善組織執行重建和人道安置，其實為強制遷村；(三)救災機制與福利政策拿捏不到平衡點¹⁰。

然而，這些比較貼近原住民災區和災民心聲的學術工作者之呼籲，好像很少進到政府、大慈善機構等挾著龐大資源的決策者的心中。在2010年4月11日，主流媒體的中國時報在幾乎噤聲245天以後，以整版的篇幅刊出針對「慈濟大愛園區」種種問題的專題報導，包括：〈霧台原民連署抗拒住大愛村〉、〈小林村會長：我們要的家不是精舍〉兩篇在地的發聲，也側寫屏東縣政府和世界展望會；並由慈濟發言的兩篇「平衡報導」，分別是〈只負責蓋屋其他都不干涉〉和〈慈濟不分宗教 大愛村裡蓋教堂〉，其為慈濟揚聲，滅火的企圖甚明顯。

儘管如此，災區的寫實訊息也並非全無傳輸平台。八八與前九二一災後重建訊息流通最大的不同是，在地方性平面報刊(包括各在地團隊的通訊刊物及社區報)幾近全面銷聲匿跡下，網路信息(特別是民間自主的獨立小眾媒體)卻驚人蓬勃地發展了起來。時至今日，除官方機構公報式的網站外，最耀人眼目、最始終如一、也在水準上精益求精的就是「莫拉克獨立新聞網」(88news.org)的通訊平台了！

這個平台自八八災後迄今，幾乎每天都有在地公民記者或駐地工作者的專欄文章，每篇文章的讀者回應也多持續不斷。它不但反映了災區各地的真實情況，也成了在地發聲的輸送管道；既催生草根視野

10 見2010年11月12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民族研究發展中心「一年過後：原住民族災後重建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的言說與感知，更成了社會議題設定的主要工具。它積累的文圖資料，不但是寶貴的災難社會史的第一手史料，更將是吾人檢視大社會、切入批判、進行回顧與解構顧的主要檔案。

丘延亮耙梳「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自災害發生到2010年4月的檔案，整理一篇批判性的回顧文章，以近乎條目式地描繪災後民間力量，在信任蕩然之叢林世界中對抗與戰鬥的諸般景像，題為「不對天災無奈，要教人禍不再」¹¹。而後丘延亮持續迄今的追蹤與盤點，自八八風災到2010年11月的16個月中，從「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的檔案，則顯示出下列幾個面向的徵兆：

(一)政府在受災的四個區塊使用不作為、急就章、行政干預、無能、欺騙、分化、無對口、柔性安撫等手段發生的事件，共123起報導：那瑪夏(44)、屏東(28)、勤和(36)、台東(15)。(二)政府實施暴力以強加統制意志、行政強制、偽稱和惡法發生的事件，共95起：那瑪夏(43)、屏東(11)、勤和(38)、台東(3)。(三)民間掙扎發聲表達民意的事件共37起：那瑪夏(5)、屏東(12)、勤和(16)、台東(4)。(四)各在地民眾及自救組織自力救濟及行動抗爭事件共46起：那瑪夏(19)、屏東(15)、勤和(9)、台東(3)。(五)大型抗爭共81起：村級(31)、鄉級(28)、縣級(12)、跨縣(4)、中央級(6)

上述盤整的進一步分析與解讀目前仍在進行中，可切入的角度甚多；但光是事件條目整理，即可顯示出政府與承接政府救災代工(或俗稱BOT)的NGO，在面臨各區塊民眾自救組織的抵制、抗爭、發聲與自立救濟之際，確曾一再個別地放棄不實際的企圖，或做出實質性的讓步(或退縮)。然而，我們始終沒有見到各級行政與執行機構有任何反省後認錯的動作，不但遑論徹底進行政策檢討；更欠缺從根本上改絃易轍、洗心革面的決心或舉止。

11 請參見丘延亮(2010)〈不對天災無奈，要教人禍不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頁363-401。

在這情況下，難怪災後兩年仍不斷有各地揭露「天災之人禍性」的質疑；例如，在「莫拉克獨立新聞網」中便指出：「災難發生時，為什麼原住民『附帶條件』的被安置？！」(2011/5/3)、「台東災區的鏡頭：是天災還是人禍?!沒聽過公部門檢討。」(2011/5/28)、「沒有廚房的民族大愛小學」(2011/6/2)、「在舊社遺址上蓋永久屋：嘉蘭重建政策爭議不斷(1)(2)(3)」(2011/6/27-29)。

事實上，這樣的聲音自災後迄今從沒有間斷過，只不過主流社會未必看見聽見。這些史實，也提醒我們得重新省思：所謂「天災」恐非歷史之偶然性，天災和人禍之間顯然交織著辯證性；或者，天災背後的人禍性恐與「災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政治經濟變動有關。

三、災難資本主義：殖民者「天災之人禍性」的政經結構

揭穿「天災之人禍性」這個事實及其機謀的洞見，其實早非新聞！Naomi Klein (2007)《THE SHOCK DOCTRINE》¹²一書(已被譯成30多種語言以上)，證據確鑿地細述了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及其雷根山寨版的史程中，權勢者如何一邊發災難財，一邊在亂局、流血、災衍中，無情地逼迫世人依他們的想像去認識生活世界，又如何藉「震撼治療」原理的種種操作與手段，把世人規訓至去首肯一種她稱為「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的建制。¹³

Klein當然知道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全球結構性災難產生和持續的根源。但是作為一個記者和反WTO前線成員，她的關注較聚焦於時事

12 英文版：Klein, N. (2007).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Y.: Metropolitan Books/ Henry Holt. 中文版：娜歐蜜·克萊恩(2009)《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台北：時報文化。

13 上揭書是藉分析對精神病患進行「電擊治療」以產生嚴重震撼的事例，大尺度地進行的深入歷史研究；涵蓋了1971年智利政變到天安門鎮壓一系列重要事件；認為它們都是災難資本主義的體現。

及操作的層面；她強調解構的是權勢與既得利益「危機言說」內部不同宗派(如凱因斯主義 VS. 原教旨資本主義)之間的戰爭。¹⁴

尤其自 1989 年以來蘇維埃體制的崩解、蘇式大治(Pax Sovieta)變成了蘇式大疫(Pox Sovieta)；發展主義危機在蘇維埃陣營中的內爆，正式向世界範圍全面的擴散¹⁵。此後不到 20 年，美式大治(Pax Americana)也愈益紕漏百出；其作為美式大疫(Pox Americana)帶原體的泡沫也如水銀瀉地、「全球化」到了地球村的每個角落。

在這個「災難全球化」的後浪推前浪海嘯中，資本／國族之發展主義利益的全球化，其本身恰是災難的核心及源頭，也就更加無所遁形了。

從另一個角度以觀：二次大戰後老式殖民主義退勢後，在東西兩大陣營冷戰煙幕下各自以其意識型態變造民識，實則進行勢力範圍分贓；在透過「對抗」外敵為藉口殘民的同時，實為進行串謀、施行互為借箭進行內部牢控的操作。美／俄宗主國經過了各自的慘澹經營，在維護了 50 年各自國族的利益後，這個「恐怖平衡」實則「暴利平分」的結構，終也隨「冷戰」的結束而無以為繼。

冷戰「結束」後的新局面，當然需要新的障眼法和欺世工具；硬功破產後兩個帝國前倨後恭、明退暗進，改用更柔性、韌性及精緻的文化、政治經濟手段，從事新新殖民主義的宰制回收(recuperation)和加工(processing)。

這個回收與加工當然以更加共謀及協同的面目出現：發展主義的百足之蟲也在死而不僵的掙扎下，更深入擴散到東西陣營挾持下的低度發展地區；經理主義則以更猖獗的面目出頭主事，作為資本主義政工幹校的 MBA 之詐欺術成為全球性的顯學，作為這種詐欺被認受之前

14 見上揭書的 part1. p.49-71.

15 丘延亮(1992)〈發展主義危機世界體系的開出：試論「蘇式大疫」的全球性含義〉。《天安門評論》，33(1)、(2)，頁 26-60。

緣的公關技倆及廣告媚術，也就成為新的治理機制(governance)的首要武器和洗腦程式，藉之成了為壟斷護航、替泡沫打氣；以之對萬眾(multitude)軟硬兼施、明轟暗襲；挾消費主義對生計百姓洗腦、進行最真切意義的、以百姓為芻狗的「冷戰」！

有趣但滑稽的是：當資本主義成為了唯一的殖民主，泡沫成為了這個全球體系唯一的營養及強心劑的時候，資本主義的扈從們，才開始驚覺到它自身的結構性死穴已暴露無遺！

資本主義假個人私利掛帥為名、行法權專屬的壟斷之實；其「功利主義」的騙局之所以可維持上百年的光景，乃拜它以「firm」(牟利行號)攬取個體與集體之生存繼替能耐的假化(Fictionalization)機制之賜¹⁶。在這個被「假化商品」言說壟斷的世界中，剩下的只有「國族法權」認可的法人(即行號)，更不容自然人及其生計的存在。

「行號」之作為唯一被考慮、肯認的「實體」存在，其結果是任何行事思考及算計就只能以某一特定(或抽象、想像的)的「公司」(Inc. Incorporation)——小自「行號」大到「國族」——為主體進行思考以區劃內外。若有它的「對象」，這「對象」也是另一個「公司／行號」或一些「類公司／行號」的法權存在，它們之間可以「交易」、「授受」、「拼合」、「分拆」等不一而足；但這些「公司／行號」變形蟲式的行為絕不涉及其銅牆鐵壁外的「世界」，因為那是公司／行號之「外」，不是它們要肯認或思考的東西。因為，「利益(或功利)的最大化」才是「公司／行號」的「資產」、「商譽」、「品牌」、「財貨」、「信用」等等及其產生的「利潤」能力或假象的最大化。

在雙進會計(Double-Entry Accounting)¹⁷的基本原則上，強調的就

16 見Karl Polanyi (1944/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以及中文許寶強、渠敬東選編(2004)《反市場的資本主義》。香港：牛津大學。第一、二、三篇；特別是其中對假化商品的討論。

17 Max Weber在他的最著名著作*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中及其他多處皆指出雙進會計是資本主義成為可能的主因之一；他的同代人也同意在雙進

是「應收」的全數最大化和正值化、「應付」的全數最小化和負值化。在這個原理的「強制」(imparative)下，經營中所遭遇和產生的「成本」、「風險」、「不確定性」、「再生產補貼」等等一干「負債」的東西要怎麼辦呢？當然，最好是能夠轉嫁或投放在別人的「公司／行號」或下游的依賴單位身上。

然而，是人都心知肚明，這樣的如意算盤當然有其限制，也絕對是不盡可能的事；別的公司／行號(不管上游或下游)都在做一樣的考慮、一樣的勾當。職是之故，最簡單的作法就是將這些負值的東西「外化」及「轉嫁」到(理論上並不存在的)「公司／行號」之間(或之外)的模糊地帶——叫做「社會」、或「自然」的東西——上面，叫它吸收、消化也罷，任其積累、腐化、發酵也無妨，垃圾往外丟、污染往外放、人力用盡即丟，工傷／工殤由工人自家承擔，或成為「社會安全」、「經濟發展」的「人命成本」！

回到當下思之：既然資本主義今得「全球化」才能生存，這個全球一體的「市場」壟罩地球村的全體社會和自然；那麼，它還有「外面」可供這個唯一的「世界行號」(Global Firm/Inc.)來「外化」、「轉嫁」或實質嫁禍於以鄰為壑的地方嗎？在根本的意義上，這樣一個「外」已經不再存在(上月球或太空移民仍太早太遠)，因此，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也就更難擱置、遮掩與逃避了！

四、災難全球化：被殖民者處身不同「世界」的血腥處境

對於這麼一個無「外」可化了的、艷稱「全球化」或變「平」¹⁸了的世

會計實施前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最近的討論可見Hans Derks(2008)“Religion,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In *Accounting, Business and Financial History*. Volume 18, Issue 2, 2008, p. 187-213. 文章討論了關於Max Weber與Werner Sombart兩造的論詰。

18 見湯瑪斯·弗里曼(Friedman Thomas L.)。2005。《世界是平的：把握這個趨勢在二十

界，資本主義核心的歐美之外，全球各地的普通百姓／生計踐行者（特別是與土地相親的在地住民以及其有機知識人），對它的成因與蔓延的理解，與殖民意識型態是少有共通之處的。

他們對克服資本主義與國族體制全球化帶來的災禍（從全球殖民化到殖民的全球化），有不同的言說；對「人類」的主體性認知以及如何走出可延續的道路，也有人民性的、非統攝疾推的、非管理主義的主張。然而，他們的聲音卻是歐美主制（hegemony）下的「主渠（主流）」學院（或稱思想壁壘）中人曾未注意聆聽、鮮少納入思考，更別說納入「反省」或予以參照論詰的。

（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歷史鬧劇

最顯著的例證就是：1992年（即哥倫布西航接觸到加勒比海Arawakian人的Guanahani島，誤以為發現了印度的五百年後）在果阿（Goa）的The Other India書店，出版了由四位南亞重要學者共筆的經典著作《The Blind Eye: 500 Year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¹⁹，反思西方五百年殖民的歷史；但此書面世近20年來卻幾乎沒見到歐美學界引介、討論（儘管它以英文書寫且由紐約The Apex Press出版發行）。

為什麼呢？因為它講了一個又一個西歐（或西化）人士不敢聽、也不願聽的故事；它更指出一個又一個資本殖民世界無言以對、無處卸責的血斑史蹟。正如書名所示：它遇到的是被弄瞎了的眼睛；他們的聲音，當然也都進了殖民主的，被殖民的知識「精英」（Elite；另譯為「倚立」）們的被弄聾了（或雖未聾卻只聽耳機內西方廣播）的耳朵！

這四位作者從他們各自的位勢（positions）和旨向（orientations）上重

一世紀才有競爭力》。台北市：雅言文化。

19 請參見Ziauddin Sardar, Ashis Nandy, Merryl Wyn Davies, Claude Alvades, Goa (1993). *The Blinded Eye: 500 Year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India: The Other India Press—The Apex Press, New York, U.S.A.

新考據史實；在重新講一個「全球範圍五百年的災難史」時，他們遂不能不開宗明義地指出：現有的「世界史」論述從第一句話開始，不免都是徹頭徹尾的顛倒是非、混淆東西、指鹿為馬的自說自話。

首先，與事實相反，哥倫布從來就無須說服他同代的任何人地球是圓的。因為1280年Hereford的Mappa Mundi早就如此圖示了；他所依據的是古典希臘和羅馬的知識，哥倫布的同代人早已知之。只是哥倫布卻相信地球是小的，他可找到(迴避阿拉伯人及回教勢力)直達印度(亞洲或東方)的短路；認為可以完成這個使命，對教皇效忠、對金主交待。

而在種種無知的「眾望所歸」迫力下他雖四次西航，結果竟使得這種自以為然的迷思更強，歐洲中心主義者宣稱他們發現了「新世界」(Mondo Novo)！而這個新世界是亞洲的一部分，它和歐洲本土之間的水域則被叫做大西洋(The Atlantic)；大西洋世界中心說和大西洋世紀，於是就在這種胡混中誕生了²⁰！哥倫布從此被說成了是個大發現者(Great Discoverer)；正是他為教皇封疆闢土、開啟了屠殺宣教、掠財虜人的帝國殖民事業。

其次，更令人詫異的是：這個大西洋世紀的胡說，到了廿一世紀還有人拿來炒作，忙不迭把當年將半個地球(Globe)當成了一個球的謬誤，重新兀自在「全球化」的艷稱中恬然產造；於資本／國族體制在在解體聲中，歐美「世界中心」竟公然再次販售「把一個球化成一個球」(Globalization)的荒唐勾當。近20年被歐西殖民宰制的學術論述，也多在這上面打轉。

揆之史實，歐西的海徑擴展路向，其形成是現實政治(Real politik)受到窒礙和經濟受到阻滯之下，力圖脫圍解困的產物。它的這個海徑轉向，一方面因阿拉伯及回教勢力雖漸退潮，卻仍橫亘歐亞大陸的地

20 上揭書：pp. 1-31。

緣現實之壓迫；另一方面乃拜十字軍東征潰敗，在屠殺無功後退守舊教殘宗故地的宗教危機所賜。教廷亟欲鹹魚翻身、另覓宗教天地，各地封侯流寇不足，紛紛改職海盜；兩造難兄難弟、於是乃攜手合作，不得不黑社會般地勾結、齊尋出路²¹！

質言之，如上書作者所證實：「第一個重商主義帝國(Mercantilist Empire)開始以一種建制化的海盜行為來組織自己……」²²這些海盜集團競爭著去取得教皇的認可及城邦既得利益的授權；他們遂以身兼多重身份之姿打家劫舍；插上旗幟就是佔領土地；樹上十字架就是把屬地收編在天堂候補的地段之中。其上被意外「發現」的「土著」，則變成不是有待拯救的化外異教罪民，就是該被滅絕的無救野蠻人。

(二)資本主義擴張與殖民地掠奪的人禍悲劇

然而，隨時間的過去，這些一度是殖民者意外的「人形物」(殖民地上不該有的東西)卻漸漸變成可以將它們變成「資源」的材料。他們從被殺戮、消滅的對象，漸漸變成可將之轉化為殖民者所用的「人力資源」，以之貢獻於其他殖民地地區的殖民事業。在避免這些「人形物」成為殖民大業的不幸和負擔的「經濟要求」下，把他們轉化為殖民事業最底層的奴隸。因此，重商主義帝國第一個最耀人眼目的「成就」除了搜刮地上地下「資源」之外，也彰顯了「全球化」最真切、最具體的實施與體現；其最突出的「發明」功績，就是以全球為範圍的工奴產造及奴隸販運了。

但是，要注意的，這個「殖民」的恐怖發明，其實在歐西本身和內部卻早已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了。所謂「殖民」的殘暴、血腥、無情與持繼都是歐洲中古以來對內「治事」(Governance)的常規(Doxa)與慣域(Habitus)中的產物。從獵巫到火刑，從滅村到圈地，從屠殺異教同宗

21 見上揭書 pp. 22-80。

22 見上揭書 p. 64。

到販賣私生子童工等等；在在說明了血跡斑斑的「內部殖民」在殖民母國內部的階層間早已是慣常實施的、成熟的統制手段。在歐西開始有了「殖民地」時，這一切不過是把內部的「殖民」再次重演，把這種惡形惡狀對「外」「推己及人」的重施故技；換句話，可以說它們只是把恐怖統治「推廣」到「異族」和「外地土著」頭上了吧！

將「殘民」手段向殖民地輸出的同時，殖民母國亦不得不將自己的「下等公民」收編，強迫他們成為外侵工具及殖民屯邊者，逼他們從事以軍事征服、以虐殺徙置等手段「平復」(pacify)蕃人、建立自以為的治世(如Pax Britannica; Pax XXXX)的工具。然而，究其實，這一切手段都非稀奇和意外的事。稀奇和意外的是：殖民利益者以「槍砲」百試不得其效的種族滅絕綺想，最後竟是靠殖民入侵者自己身上的「病菌」，成為使原住民滅族的最有效工具。

今日，哥倫布西航「發現印度」的鬧劇雖已被揭露，但主渠意識型態者仍不斷維持「發現新大陸」的漫天大謊和迷思神話。於是，加勒比海的諸群島就變成「西印度群島」了！諷刺的是，欺人不足以自欺，美洲的「新大陸」畢竟與亞洲無關，更非什麼「印度」；儘管北美原住民竟也變成「美洲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s)被指稱！

而哥倫布之後，1520年葡萄牙的Ferdinand Magellan在西班牙王室資助下自美洲東岸南下駛越大西洋，繞過南美極南端，在南美的西岸尖端發現了一系列人煙遍在的島嶼；他因之命名它們叫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即從「Land of Smoke」後改稱「Land of Fire」)。

而後在1830年有四位「火地島」民被「請」上英國船Beagle號，存活的三人被帶到倫敦見英王和英后；達爾文事後隨Beagle號帶了三人回到火地，並做了詳細的觀察紀錄。再50年後，智利和阿根廷的歐洲殖民者發現島嶼有金；在淘金熱潮下瘋狂湧入移民，造成了惡名昭張的「Selknam種族滅絕」(Selknam Genocide)事件。短短50年間，火地島上Selknam人及Yagan人遂在入侵者暴力、白人身上帶來的流行病，及強

迫徙置的人禍天災中，被徹底滅絕了。²³

此後，資本利益、國族統攝和殖民勢力所到之處，原住民族群的種族滅絕事件就層出不窮；直至今日的當下，仍持續在各地發生。

例如，澳洲海外大島塔斯馬尼亞原住民(Tasmanian Aborigines)的滅族。塔斯馬尼亞島民在島上生活了至少三萬五千年，約一萬年前因海平面上升，與澳洲大陸分離；當1803年英國殖民勢力侵入時，島上至少還有五千到一萬人，短短30年後，在1833年因屠殺、缺乏抗禦白人傳染疾患免疫力等因素，人口只剩下300人。這300人後來又被強迫徙置到Flinders Island，終於，最後一個塔斯馬尼亞婦女Truganini在1876年也死了，整個族群及文化隨之永遠消亡！²⁴

這樣種族與文化滅絕的慘劇，當下最新的事例，則是印度洋Andaman島上唯一講「Bo」語(十大安達曼語之一)的Boa Sr.女士；她是在2004年12月的南亞海嘯中存活了下來的人。她所屬的這些個族群在安達曼群島生活了至少六萬五千年，是地球上續存最古老的人類文化之一；在1858年英國殖民時，至少有五千人，現在只剩了52人。²⁵請看看照片中她炯炯的眼神，透露了什麼？



23 請參考Wikipedia中有關Tierra Del Fuego的網頁。

24 請參考Wikipedia中有關Tasmanian的網頁。

25 見 *The Independent*, Andrew Buncombe (Asia Correspondent). "With the death, Boa Sr, her people and their songs fall silent forever", 2010/2/5 所刊，及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with-the-death-of-boa-sr-her-people-and-their-songs-fall-silent-forever-1890047.html>. (2010/12/2 瀏覽) Boa Sr. 的照片是引用此文的。

由於英國殖民者無力「平復」(pacify)這些族群，殖民當局就試圖「文明化」(Civilize)他們，把他們捉到安達曼之家(Andaman Home)豢養；但在安達曼之家出生的150個小孩中，沒有一個活到過兩歲大。

進一步說，一個個自力存活了五、六萬年的族群與文化，在與白人殖民者接觸後，在短短的幾十年或近百年中就被徹底滅族和摧毀了，難道這些是因為什麼「自然的」自然災害、什麼「自然的」病毒，或任何「天然的」不可抗力的作用因素使然嗎？就算它們有某種形式的「天災」的成份，嚴格地歷史的和結構的來看，它們難道不恰是「殖民人禍」的伴隨物或副產品嗎？

二十世紀20年代(1917-1920)的全球性流感在世界範圍內流竄，死了五千萬到一億人(當時人口的百分之三)，它隨白人船艦腳步遠播到極地和太平洋諸島，其起源是否來自第一次大戰的重大傷亡迄今猶無定論。但近年卻有研究指出台灣島上原住民避入高海拔山區，及其以「獵頭」形式出現產生對平地流感的隔離，似乎是島上原住民族群免遭滅絕的歷史「巧合」或生存智慧／知識²⁶。

26 蔡承豪(2005)〈流感與出草：台中地區的泰雅族動亂(1918-1923)〉。《台灣文獻》，56(1)，頁171-205。

五、天災之人禍性的辯證省思

在此，有必要重新思考：這些與自然及其他人群共存的在地生計人口，是到了什麼時候、被什麼人、經過什麼手段，才被變成為被殖民主視為「土著」(直譯Dirt Elements；訛稱Aborigines、Indigenous People)²⁷的「原住民」呢？以及，原住民這些和大自然互動、千百年累積下來的生態知識與生存智慧，或稱為「文化基因庫」的人類無形文化遺產，為何總沒被國族／資本與殖民者看見？！

(一)原初豐裕社會對自然現象警覺謙卑的生存智慧

千百萬年的地球，在人類出現後到「摩登化」(Modernization)前，可說是生活在自足、相對穩定的天地；在這數(十)萬年中，人類各在地族群和自然及其種種變化交涉圖存，在「創造性的適應」歷程裡，衍發了文化、創發了種種知識智慧，各部族學會和環繞自身的大自然對話、和平相處，直到近代殖民主義所謂摩登化的到來。在這之前，他們在原初的豐裕中，鮮少有把「大自然現象」純然當作災厄、苦難來認識和理解的²⁸。

27 Aborigines一詞和Indigenous一詞都是早年西方殖民者借自動物學及其概念以指稱他們「發現」的異域中「人形物」的「代」名詞；雖後來通用來指特定的族群(如Australia Aborigines)；其偏見／誤軋和濫用(abuse)極為明顯。這種影響和意涵迄今仍未被徹底批判；是故，它和吾人今日台灣原住民諸族群抗爭了幾十年取得的「原住民」一辭不可等同，也不能互相轉譯。我主張將「原住民」直譯為Primordial Inhabitants，多年前在公開場合被某(有拿了英國某理工學院博士的)立法委員「指正」，怪我不譯成Aborigines或Indigenous People；可見西方中心的殖民宰制之深！同理，與英語動物學名詞雷同的「土著」一辭、我迄未徹底追出他的來由(疑心它如其他很多「科學」名詞也是從日文直接拿過來用的？！)但明顯的是它的貶意並不下於英文的上述二辭，要把它譯成英文的話，我也只好把它直譯為Dirt Elements了！

28 請參見Marshall Sahlins,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In Marshall Sahlins. 1972. *Stone-Age Economics*.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2. 中譯請見丘延亮譯(1988)〈原初豐裕社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頁159-181。

對他們而言，人類由生計積累的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它的對立體；反之亦然。地球的任何一個人類存活的角落，不外乎是幾十萬年來人類與其他物種共有、與各有生力量的各種知識體系交通及互動的基磐與載體；它在人類本身之外的存有不是什麼人要去「征服」或「發現」的資源，或去欲予以宰制、甚至逃避宰制的恐怖平衡競技場。日日力行的生計主體者對它們的生存知識，更不是欺凌非我族類或藉之唯我獨尊獨享的秘術；它們是各族群生存知識的積聚、互通有無、藉之持續的依恃。

二十一世紀初臨的2004年12月、發生在印度洋的大海嘯，就有這個悖理事實最真切的特寫，並留下這張令人震驚的寫真²⁹：



在2004年大海嘯時印度次大陸旁一系列安達曼群島(即Boa Sr.女士的居地)是海嘯衝擊最最厲害的地方，但這海島上面也有迄今最不被外面文化干擾的原住民，海嘯後原本外界認為他們必已毀家滅族。然而，災難後過幾天，印度空軍派直昇機過去探究災情時，發現這些原住民幾乎完全沒受到傷害；反倒是當地原住民見到直升機，覺得它是

29 海嘯後發生四天，Associated Press的Neelesh Misra從印度Port Blair發出報導“Stone age cultures survive tsunami waves”開始了關於當地原住民事先知情、且早已遷入內陸高山的事；並從印度空軍取得了這張照片。資料來源：請參見：http://www.msnbc.msn.com/id/6786476/ns/world_news-tsunami_a_year_later/t/stone-age-cultures-survive-tsunami-waves/。

來傷害他們的，機上軍人因而拍下這張原住民手拿弓箭射向直昇機的照片。

有趣的是，這個直升機所屬的「印度空軍」幾乎所有的先進設備，多在這次災難中被摧毀了。在安達曼島的例子，這個毫無災情的「意外發現」被報導後，各地「專家」們開始關心和想去研究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在地震及海嘯前幾天，這些原住民部族整都往內陸山上搬遷了！於是，不解的專家們有人說那些原住民「聞」得到風，有人說他們有「第六感」；但，說原住民有第六感會聞風，恰恰說明了是因為我們的無知，因為我們不曉得我們有多少事情不知道。

事實上，這些原住民在災難中存活倖免於難，證明這是他們和土地長期互動，對特定的生態徵召等細微訊息密切掌握；他們的知識蘊含了深厚的對於土地、動植物、土壤、礦物、水源等等之使用和維護知識，並擁有豐富的避災知識傳承。原住民擁有的這些傳統知能，使得他們的種族有種特別的警覺和警知，他們的警覺和警知，又是多少年來生存在這個地方的歷史經驗和生命智慧的累積！他們以民俗、口述、神話、禁忌、儀式等等方式，維繫了屬於他們族群所特有的一個個綿密的環境與文化知識體系。

我們不但沒有這個知識，連承認他們有知識的能力都沒有。也許我們會以為原住民逃到山上，應該是倉皇、身無長物的；但各族群身負的卻是他人所無的傳統知識，他們不只是帶著家小、帶著動物。他們知道災難要來了，因為災難不只是來這一次；它們曾經來過，以後也還會再來，而且也不會只來一次。研究漸漸證明，千百年來這些海嘯並非突發的、偶爾的事情；在這樣的對照下，沒有自然觀和歷史經驗的印度空軍基地整個被毀，並不奇怪。

只不過，為何這些個被當作「土著」的原住民要射飛機？或許正因他知道那個直昇機、外面的「侵入者」才是真正的威脅。他們最大的危機從來都不是自然災害，不是山崩地裂；而是外來者在毫無知識、毫

無警戒的狀況下侵入他們的生活領域內，在無法抵抗或難以隔離的狀態下，和「文明人」接觸的苦果。

但同樣的事發生在台灣，卻往往多被忽略了。台灣上下的現代文明人自以為掌握了所有知識，自然不會相信原住民可能會預測到災難要來。據中部地區原住民表示，在1999年九二一地震前幾天即有很多生物、動物昆蟲界的「反常」現象；當時沒人注意，也不想去懂，事後才發覺它們果和災害有微妙關連。

我們同樣不曉得台灣原住民(在島上生活幾千幾萬年的各原住民部落族群)，他們從他們的生存環境、經驗傳承、口述史和神話當中，遺留多少真切的生存知識和生態智慧。「摩登人」的我們，直到了大地震、大海嘯的時候，才發現原來他們這些知識是「有用的」。作為外人的外來者(它們是白的也好；棕的、黃的、黑的也罷!)我們台灣大社會從來都不知道自己身上帶有多少細菌病毒，儘管我們可能有抗原、抗體，使我們不會生病；但我們會傳染給人家。而對被傳染的族群言，有時那已不是疾病，卻是致命的種族滅絕危機！

(二)災難資本主義藉「上帝之手」的版圖擴張

殖民全球化和全球化殖民的歷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是資本殖民帶來了(諛稱意外的)疫病、也帶來所謂的「自然災害」。儘管如此，到了近代這個結構和機制，卻經過了一再顛倒和錯置。這種錯亂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在災難成為資本家與殖民者用來「震嚇」的工具，給予更多無孔不入、冷血資本／國族殖民以「發災難財」的機會，並促成它們藉機進一步毀棄自然經濟、滅絕自然人與族群生計，變本加厲地進行震攝、訛詐、趁虛而入、混水摸魚的勾當。

根據 Klein 的研究與書證(documentation)：這種趁人(民)之危的惡劣人品敗露，經典名言之一就是美國紐奧良颶風大難後，代表「地產禿鷹」利益的共和黨眾議員 Richard Baker 立即發出喜出望外、大發橫財夢

的狂言說：「我們終於可以把紐奧良的公共住宅剷除掉了；我們做不到的，上帝做到了。」³⁰

好一個用(自然)災難成就(資本)人禍的慷慨上帝！這個「上帝」的口實，當然就是最就手的將人禍「自然」化、將「殘民」推諉為「天譴」的最佳工具！這種搬神弄怪的五鬼搬運術，它所班門弄斧的神怪，面目當然也不只是一種或一個。美國的颶風Katrina結束以後，原先的城區突然出現了很多私人資本的預定地；南亞大海嘯過去也一樣；整個災難區，公立學校直接破產，私立學校進來——結果有錢的人可以讀很好的學校，沒有錢的人就沒有學校讀。

這種掠奪的廿一世紀版本除紐奧良「重建」外，斯里蘭卡(Sri Lanka)災後的漁村也一個個消失，轉變成國際旅遊度假中心。海岸地區的公立學校成了國際(慈善)財團的「特約」學校(“Charter Schools”)，這些都只是駭人聽聞的具體事實的一小部份。而在台灣的現實中，則以慈悲為懷的善人義助者面目出現，慈善機構「善心暴力」比拼較力、瓜分重建版圖³¹，財團(如鴻海集團)藉「有機農業」之名行新「圈地政策」之實，也昭然若現。

而在《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一書引起注意後，Naomi Klein和Alfonso Cuarón合作的影片在威尼斯影展也引起大騷動；片子回溯作為資本殖民上帝的全球代理人(美式帝國主義)利用極端暴力手段，推翻智利民選總統Allende，扶持軍閥皮諾切(Pinoche)為跨國公司實施「災後重建」的經典事例。

上述的斑斑鮮血教訓，具實地部份回答了我們不得不有的提問：我們為了什麼要排除災難？我們一直聽到「危機說」，但這個危機到底是誰的危機？這些個危機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它們的「解決」是為

30 見Naomi Klein (2007). “Blank is beautiful: Three decades of erasing and remaking the world”,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p.4

31 請參見陳永龍(2009. 08. 21)〈重建應尊重部落主體精神〉，蘋果日報。

誰去「解決」？在這過程中又是什麼人給「解決」掉了？

回到台灣經驗個案。八八風災一年多以來，受災地區的人們不管在災區、在營區，在種種原住民的救災行動當中；或身在所謂的永久屋基地上，或是處在中繼屋的爭議中，他們面對的困難在在牽涉到政治跟經濟的、社會跟土地的複雜利益問題。他們實質面對的，是極具巨大的利益跟極巨大的災難的一種組合、一種互饋和擴張。牽涉其中有各式各樣的人：有政客、投機客、「善霸」等、不一而足。災難對他們恐怕不一定是壞事，反而是一個爭權奪利、發災難財的機會³²。

無可諱言，八八風災以來劉兆玄和吳敦義兩個「內閣」極力謀合的「產業領養」與「和慈善機構合作」大計，它所體現的才是另一個更打高空的歷史「返祖」與「反諷」。揆之近四百年泰西殖民宰制下資本主義依法權強推的史程；今日的天災似乎恰恰可以被當作是自然力為人群的離鄉離土（不必求諸圈地運動或社安法例〔Polanyi, 1954〕）提供了前題；在自然經濟「自動」地毀棄之後、為資本的侵入創造了有利條件。它更備便了一群群失依無助、在無產中得仗工資維生求生的產業後備軍。³³

稍有政治經濟學常識及敏感的人當然心裡有數，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中、精算敏犀的企業家們及時的「協助災民就業、跨足有機農業」³⁴當然是可以預測的邏輯行動。政府「無限期提供土地」、慈善機構挾善款的「永久屋模範安置」、加上為資本找出路的「全數收購完全輔導就業」保證，一時就成為了完美的三合一即溶咖啡；為災區、災民、失所的災黎社群提供了飲鳩止渴的罐裝飲料。

這個「工程」所能產生的深重政經後果，有一天將足以重寫產業資

32 見陳永龍(2010)〈莫拉克災後原住民部落再生的主體化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頁403-435。

33 見社論(2009. 9. 6)〈慎防災難資本主義肆虐〉，《立報》。及張小虹(2009. 8. 22)〈驚嚇的政治災難學〉，《中國時報》。

34 見崔慈悌(2009. 9. 7)〈郭台銘跨足有機農業〉，《工商時報》。

本變回商業資本、再變回封建資本的歷史倒轉迴程；它當然也是所有關切台灣總體命運的每一個人不能不密切關注的。

八八水災「重建」迄今，已有不少現象令我們想到 Katrina 風災後的紐奧良，私立學校取代了公立學校；或海嘯後的斯里蘭卡，處處蓋起渡假旅館。例如，原住民部落的災後重建，明明有各種選擇的可能，最後幾乎只被限定遷居至「必須價購、已變相財團化」了的台糖土地蓋永久屋，並「圈地」作為財團的有機農場，或配合讓財團認養「學校」的興建；背後，真的只有「純然的善心」動機嗎？

假如不是，我們的明天是否可以避免這些？在新的、人造的危機，在災害「重建／重見」的危機中，我們能否避免再次受到了二次、三次侵害？數不清的外力介入，不管以慈善、救濟、扶振等為名，往往都體現了它們是不受阻擋的支配力量；而這些支配力量的一言一行，卻幾乎都沒問過「受災者／受助者」要不要？或試圖傾聽、了解到他們需要什麼？

彷彿，在「風險管理」的潮流下，災難防救成為國家、慈善團體等介入外力的競合場，只有殖民者的「我們」有能力幫「他們」解決問題、遠離風險。但事情真是這樣嗎？或許，我們得更警醒：資本主義隨時都想藉各種災難（不論天災人禍），趁虛而入來增加壟斷性的利得。

六、風險社會的風險和草根生計的自立

既然災難無所不在，「風險社會」說和風險管理，儼然也會在災難資本主義和管理主義的社會裡，成為一種顯學。解讀風險社會的意識型態，省思草根生計者自立家園的社會安全涵義，才可能免於「天災之人禍性」的危害。

(一) 解讀「風險社會」意識型態潛藏的風險

回到與「災難」有關的社會學省思，所謂「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應是近廿年當紅概念。在西方／東方國族分贖受阻、對內盤剝受到抵制、向外擴張也再找不到可供其壓制、剝削及榨取的殖民處女地的二十世紀末，歐美兩位代表性的社會學者U. Beck和A. Giddens，在90年代中「先知」似地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³⁵ 論述世紀末或種種悲情狀況中，「人類」在「過去」遭受自然災害(nature disasters)，已在「摩登化過程」(Modernization process)中被人為產造的各種風險(manufacture risks)所取代，包括污染、新疫病、犯罪等等。

人們在此風險社會中，對工業體制、政府官僚和專家學者們，都產生高度的不信任。社會階級的分化動力，從爭權奪富的能力高下，轉移到對避災／除災處境等知識和能耐的掌握上面。他們定義「風險社會」就是這麼個日益縈繫於未來(及安全)而油生風險意念的社會。³⁶ 不但如此，Beck也指出這種「人禍」的傳播，包含一種「回籠效應」(boomerang effect)；產造風險者生產的各種災衍，轉個彎回頭終使自己也受害，風險的反撲，最終也令加害者身陷其中。³⁷

今日回看20年前Beck和Giddens的「風險社會」言說，它雖被第三世界大量進口，被西方學術殖民地(如台灣)「吸收」、挪用；但它在西歐原產地早失去聲望，在這些進口「拿來主義」的地區，也沒產生認知上的省思和突破。自災禍日益頻仍、一波波「全球化」的浪潮中回觀，這個言說即使在當年也只是後見之明，它本身就是「回籠效應」的真實寫照：一種以西歐北美為中心的風險產造重鎮，在外化無處、轉嫁無能下，開始成為種種人禍「回歸」的遁逃藪！

35 見Ulrich Beck(1992).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及Anthony Giddens(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6 見A. Giddens 上揭書。

37 見U.Beck上揭書。

因此，儘管「風險社會」是一種提醒與警醒，但其言說責咎不分、倒果為因，對不同文化之環境敏感性顛倒錯置，期以更多「摩登性」解「摩登性」之危的套套邏輯，加上阿Q式的無力感，都使這個論述難以自圓其說。因為它完全是歐洲中心的自說自話，是西歐衰敗中試圖「自救」的產物，對「危機」的視野劃地自限(parochial/ provincial)，更缺乏政治經濟學的關注與視野。

質言之，他們所謂的「反省」(reflection)，其實是只准「我們」(西歐摩登化)「人類」的「世界」去做，只有「我們」才有資格、有能力「反省」或「撥亂反正」。這種自我實現的預告(self-fulfilling prophesy)，當然必將被全球人禍天災下自保求存的社群，以他們的行動與抗爭駁倒了。

若以此「驚覺」作用，映照一次次「全球」抗暖化「國際」會議；G「N」個國家多相互推諉演出，更顯一齣齣官話和鬧劇。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在1997年12月制定「京都議定書」起，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便清楚設定目標；但直至2010年11月在Adelfo Regino Montes的「國際原住民氣候論壇」(IIPFCC)，仍得為全球360萬原住民發聲，要求「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UNFCCC)儘速制訂各國明確排碳標準，以保護原住民的環境與人權。³⁸

(二)草根生計自為自立的家園守護

與「風險社會」呈鮮明對照的反例，在台灣，不論「樂生療養院」或「三鶯部落、撒烏瓦知部落」的生存抗爭，恰是這些已「在地性」建立了生活知識和土地情感的社群，藉著「社會性的自我保護」歷程，有尊嚴地活出別於「風險社會」的方式。

尤其，在「新北市」都會化進程中，沿新店溪、大漢溪河畔自存營生的原住民以自己的雙手，一木一石由無到有創立了生計和居室，依

38 見潘紀揚(2010. 12. 2)〈首當其衝原民盼聯合國制定排碳標準〉，新頭殼網站：<http://newtalk.tw/>。(2010/12/2瀏覽)

傳統慣習智慧在河邊野地，和大自然進行創造性的適應之演化，自立自為地衍生了營活的家園。他們必須如此維生，當然是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結果。從被迫離原鄉到流落城市、逐零工而居，至礦災工殤、欠薪無著等等，在資源缺乏、人事疏離的異鄉，他們只能祭出原鄉部落的生存本事，默默再聚重組，創造了大大小小的共生社群。

這些「都市部落」的無名存在，不知道為政府省了多少麻煩；也先發性地防止了許多「社會」問題，又代庖了多少「社會福利」的行事，節省了多少納稅人的稅款³⁹！儘管如此，我們的政府非但沒檢討致使阿美族「流離失所」的政策因素，卻以「河川治理」及「保護河濱部落原住民安危」之名，強行拆除之實，並美言之乃為減低社會的風險，宣示抗災防患的效能及決心。「風險社會」的言說，就是這樣被技術官僚挪用，成了統制施暴、霸凌邊緣族群的依據。

若映照這幾個都市部落所在的河濱開發案，如河濱自行車道開發（撒屋瓦知）、捷運纜車計畫（三鶯）、房地產「千米水岸」奇蹟（溪洲）等等，便不難發現這些擬欲拆除河岸部落的背後，和財團、房地產、土地開發等都有微妙關聯。

當然，饒富趣味的是，當2009年2月20日桃園縣府強拆大溪河濱部落，政府引發的鬧劇上演不到一個月，「撒屋瓦知」部落就在張進財牧師的領導下，在生存抗爭中昂然地重新站立起來，讓悲劇轉成為家園抗爭的範本和悲壯喜劇，溫暖每個人心的希望故事⁴⁰。

據多年考察這裡的阿美族農耕文化、親身參與部落生活實踐的盧建銘和許淑真表示：經過被拆後四個月，族人集體在Adawang（大帳篷）下共同生活避難，透過「共同工作」、「家族家戶拜訪」、「共同採集

39 見陳永龍(2010)〈河岸邦查部落再生成字漂流族群生計重建：阿美族「都市原住民」自立家園的社會安全涵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7，頁135-175。

40 見撒烏瓦知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saowac/archives/cat_667871.html。特別是阿喊的〈撒烏瓦知部落拆除/抗爭過程紀事〉文與圖。

分享」、「族語教會活動」、「拜訪有墾地族人」等「吃大鍋飯」的協力互助活動；在建築群落(Kasa Loma')重建後，由「菜園」中長出的聚落不但恢復了生機生計，更在生態及社會生活上有飛躍的創發⁴¹。生存抗爭，讓30多年來集居但無組織的talo'an(農寮)聚落，重新「選舉頭目」、「命名部落」而誕生了「撒烏瓦知」部落！

總結災後抗爭自救的艱辛歷程，在部落被強行「破壞性建設」的人禍後第二個春節，官僚、政客、庸官撒手棄之不顧，並不意味國族／資本破壞百姓生身依持、殺滅生民文化生計的勢力消褪；然而災民們實事求是地進行盤點，部落開了上百次會、上了幾十次街頭，面對強大的權勢毫不畏懼，在大戰略及小戰術方面一一迎擊。

撒烏瓦知、崁津、三鶯、溪州等「河岸部落」再生成的經驗，都是被威嚇或強拆多次的部落，他們總神速地集體自力重建，奮力抗爭之餘更積極連線，他們知道抗爭遠遠未曾結束，團結必須繼續下去，才能活出有尊嚴的生活。而他們努力讓部落「活出來」的社會行動，也逼使地方政府無法逃避，而需正視這些部落有權在此活下去的生存課題⁴²。

部落再生成的生存抗爭與生活踐行，不但是對一己生存空間「美學少一些、倫理多一些」(Less Aesthetics, more ethics)的具體實現，且實證了部落上下在日日生活的「韌命」⁴³中，活出了生計百姓的力量，也給予

41 請參見盧建銘、許淑真、張進財頭目等(2010)〈撒烏瓦知部落水岸生活的重建〉，於第四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災後河川子民·部落文化論壇》，蔡瑞月文化基金會，2010/4/10，頁24-41。

42 見2010年12月16日新北市上任次日的朱立倫前往三鶯溪州二部落「參訪」的報導。關於三鶯部落30年經歷七次強拆、於2008年成功阻擋第八次強拆、抗爭至今的歷史和理述，請見江一豪。2011/1/8-9。〈部落、在都市擴張的空間鬥爭中誕生〉，「2011文化研究學會年會」會議論文。

43 謝佩珍在他〈變動與再結構〉一文的結尾提到了我《實質民主》一書61-71頁的討論、用了「韌命」(閩南語 ruen mia)一辭；這辭對她似乎意味了「幾乎是『自生自滅』」；而非我比較正面的認識到這種「韌命」之力的「自力更生」、「自力營生」側面。見謝佩珍。2001/5/9。〈變動與再結構：九二一震災後的農村家屋重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

其他山下山上困境中的部落必要的自信與可見的希望：只要長期堅持生計者的主體性，堅持一木一石、一草一葉地親手親為，不管在什麼環境下，部落必能在新的空間形式、新的時間框架下，凸顯出部落自救的特殊性，找尋出路、創造生機，把部落給活出來！

這些堅持長遠的、比較根本的收穫，是向大社會及當權者爭取到「部落生活」與「部落社群特殊性、優越性」的理解與認可，使「部落」成為了台灣社會不可或缺的建制與實體。

若以「撒烏瓦知」經驗映照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邵族「在重返Puzi」祖居地後，日夜抗爭力圖復振而有今日「伊達邵園區」的存在⁴⁴，這些原住民部族「重新活出來」是神話嗎？是奇蹟嗎？其「部落再生成」知識和動能，是所謂特有的「第六感」嗎？如果不是，我們可以從中看見的、被提點的，是些什麼呢？

七、結語：每天一起吃飯、活出部落巧實力

不管是人禍或的天災，受損害和被污名者都不能只是食指向外、光會自憐或指責外人外力。相反地，我們要有有效的自我提昇、找到出路，也得面對一己的認知缺陷，反省批判，建立自己另翼的理解和想像。

重讀近代第三世界和原住民災難的歷史，恐怕人禍是遠多過天災；或說「天災實乃充滿人禍性」並隨著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全球化擴張，在世界各地蔓延開來。一方面，災難「外化」為所謂「貧窮落後」地區掠奪自然資源、毀壞生態體系、剝削廉價勞工的殖民地問題；另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題綱，頁28。以及丘延亮(2008)〈從兩種「中產階級」談知識分子與知識人〉，《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頁49-80。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

44 邵族九二一地震後的重生，請參見陳永龍(2003)《重讀水沙連：從水域文化之保育理述邵族人生存抗爭》，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一方面，當災難無可外化時，終於招致大自然地反撲，也回向歐美中心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國度。

十八世紀以後，西方帝國主義擴張所及之地，主要以「戰爭」的世界化或大殖民主和資本家壟斷性的利潤。從區域性戰爭到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最後用兩顆原子彈解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卻也召喚出「風險社會」和全球災難共同體的徵兆。而後，它轉以人們意識為主戰場，藉「新」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的意識型態，透過文本世界、媒體等進行思想操弄宰控。這個資本／國族利益對付老百姓的「冷」戰，除了利誘外就是威逼，災難社會、危機論遂成了它主要的說辭和工具。

關鍵是：大家都被灌輸有危機，但不知是誰的危機？也不曉得該是誰去解決？為誰解決？因此，既得利益者在這個宣稱的「威脅」下力倡以「發展」來解決危機，它掩蓋的事實是：危機恰恰是發展必然的結果。災難也是同樣的道理，災難是怎麼來的？全球氣候變化、一個個從自然衍生及於社會人文的災衍，它們是結果還是原因？誰是受害者？

可悲的是：或許我們迄今仍讓受害者繼續受到責難（譬如說原住民亂墾山地），難道上述論證的人禍天災是受害者的責任嗎？過往政府與財團濫伐、縱容漢人農業上山濫墾，再就地合法化違法民宿的爛建；種種今日官方和善霸大呼小叫要進行森林保育，要原住遷下山「讓山林休養生息」的言說，卻把破壞整個森林生態系統的元兇，扭曲、錯怪成原住民的過失。

事實上，被主流社會視為「自然資源」的「大自然」並非取之不竭，也非用完即丟，丟完它會自己回來的東西。對原住民族社群而言，自然的供養與警示，從來不曾停止；千百年來，原住民都是和天候變動、自然災難一起生活過來的。因此，得有這些人傳承與大自然有關的生活知識和生存技能，因為這些都是多樣性的文化基因庫；傳承原

住民的山林智慧，就是對生態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基因庫的保育、維護和學習。

原住民族有他們的知識、有他們的傳承、他們的「第六感」。大自然是他們天天生活在其中、不斷要回去再次生活、必須持續才能永續生活的物質基礎。在它上面共有共享的有生力量，社群之間彼此要善待，因為大自然是祖靈與神靈的恩賜，也是部落子嗣的依仗。

就全世界的自然社群(特別是原住民的部落社會)而言，這些人群的人與人的連結(*connectedness*)樣式以及社會生活諸面相，特別是經濟、生計層面上的「著床性」⁴⁵(*embeddedness*)，在在都體現了Tönnies對*Gesellschaft*和*Wesenwille*的解析⁴⁶。這些社群協力共存之道的根本依歸是：它們是母子身心相屬的關係；是夫妻共同生活共同建構家庭、並在其中進行親密身體接觸的關係；是兄弟姊妹手足扶持共同成長的關係；是跟鄰里互助建立互信、共有共榮的關係；換言之，是在血緣、親屬、地緣關係上，發展出來的社群生活共同體。

對於原住民與大自然、與社群、與信仰的協和關係，我們要尊重、要學習；大社會亟需要保育的，正是這些原住民族部落獨特的「地方知識」。若不幸哪天地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將淹沒大台北盆地；結果

45 經濟人類學和經濟社會學反對就經濟現象及其論詰／分析從具體的社會組織與人際關係中抽離開來討論；其理述的一個基本概念就是社會生活中經濟行為的*Embeddedness*。過去中譯把它硬生生譯成「鑲嵌」，好像是硬生生把不相干的東西加到什麼東西的表面，或者是硬加些什麼光彩的貴重東西在平實無華的表面上——這個譯法當然大錯特錯。為了撥亂反正，也為了對抗那些花巧的意象。我把它直譯為「著床性」。

46 請參考Feroinand Tönnies. Edited by Charles P. Loomis (1957) *Community and Society: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East Lansing: Th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此書中把*Gemeinschaft*英譯為Community和把*Wesenwille*英譯為Nature will都是不夠精確的。請參考丘延亮(1995)《後現代政治》。台北市：唐山出版社；丘延亮(2000)〈三隻老虎的故事：「政治社會」的再思考〉，收錄於陳光興主編，《發現政治社會：現代性、國家暴力與後殖民主義》，頁73-80。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丘延亮(2008)《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雜誌。

是大家都得往山上求生！但，若我們已經不曉得山林知識和生態知能，或者山地早就摧毀掉了，那才是真的走投無路、求生無門。

揆之目前原民會主導中央強推的「自治法」；它明顯是不但捨本逐末之舉、更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設計」。因為它偏違陳舜玲碩士論文中《原住民族運動中「權利法制化」進路的困局：兼論建構中的台灣原住民族自治》結論中「鬆動、而非強化國家權力的抵抗策略」的主張。⁴⁷

準此，20年前原住民運動就提出了具普遍意義的「部落主義」主張，而魯凱族台邦·撒沙勒在2004年攻讀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時，著述《尋找失落的箭矢：部落主義的視野和行動》⁴⁸一書，肯認了「部落」作為社群、作為人群生計地帶、作為文化創發空間、作為生活智慧跟生命經驗累積的再聚時空。這些主張與認識在「災難世紀」的今日，仍對大社會具有嶄新的意義！

而在受夠政府、慈善機構、資本主等的道德頤氣之後，社群的軟實力重新找到了自己，其成長和結盟在可見的將來，必能更好地投身在社會信任破產後的叢林世界中，針對弱肉強食、硬力毫奪進行戰鬥；它也將證明「硬」實力其實是「愚」實力，而人民的「軟」實力才是真正的「巧」實力。而社群及文化的「分進合陣」，終將抵制官僚與資本的「霸王硬上功」！

因為，「歷史」是不會終止的；抗爭即使在「輪迴」與「返祖」之間，也不會稍事歇息。有暴力就有抗爭，有權貴硬實力壓迫弱者，就有人民軟實力覺醒自救、突圍與發聲；此即Polanyi所言「雙向運動」的旨意，也是「社會性自我防護」的真切運行。

47 見陳舜玲(2002)《原住民族運動中「權利法制化」進路的困局》，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85-201。

48 參見台邦·撒沙勒(2004)《尋找失落的箭矢：部落主義的視野和行動》。台北：南天書局。

如同八八災後在生存抗爭中成長、茁壯的部落組織，需要的是自主的時間與空間，重新完善部落再生成的實踐與想像。他們未來仍必須在國族／資本操弄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中，在下列幾個地方重建生活領域，它包括：

在「徙置區」(即所謂的「永久屋」)中戮力創新生活。

在「避災區」(即力爭的「中繼屋」)中生聚教訓、休養生息。

在「原居地」(即原初的「上部落」)保育自然、復振文化基地。

在山下「庇護所」(即與上部落對應的「下部落」／濟助據點)自立自為。

因此，不論哪個在地部落活出來，都直接證明了：社群軟實力的重建，不但可針對硬性壓迫打個平手，更能藉部落創發的社群創造力，與天災共存、與人禍拮抗，一步一腳印，走向長遠的社群分享和文化再生成之路。

回顧2010年12月25日(八八風災後第504日)屏東好茶、大社、瑪家三個幾乎毀村的部落，幾經波折，終於遷入「瑪家農場」集體居住，並以當地地名稱之為「禮納里」部落，即令在豔陽的慶典下的花巧行禮如儀中，仍然掩蓋不了族人們迄今猶未平復的創傷、爭議與疑慮。流離雖已結束、生活猶待重建、回鄉的願望仍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天邊、谷間。

這一天對部落而言，真正可資慶賀的只有一件事：它標緻了五百多日的外力強勢介入下，終於在自以為有所「交待」的「面子工程」告一段落後，功成身退；政府、慈善機構、資本投機等推手將會紛紛退場。儘管目前當地仍缺乏生計營活者必須的土地(甚至連墓園也不在永久屋規劃內)，也欠奉部落集體進行社群自治的允諾；但無論如何，三個部落、近五百戶「災／難民」總算有了落腳處。

終究，入住只是重新出發的第一步；家不是規劃或營建出來的，家是要在日日的生活中活出來的。如同西諺所言：房子不是家(House

is not Home)，心之所在處(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才是家。

我們也當記取自九二一到八八災後的社區建築師謝英俊之言，其對災後重建的提醒：「空間不只是一個空的地方；這個地方是有人的，是有人在活動的，是因人的交往而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空間。時間也不是空洞的；時間、前前後後、過去現在，都不是沒有內容的。任何時間都是一定的社會、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由每一步一腳印的生命經驗所累積出來的！」⁴⁹

最後，台東縣排灣族大家長的高正治醫師，更給了我們最重要的提示；他指出真正的「重建」務必要認識到：「災難最主要的意義，是要部落動員起來！部落裡面的成員都要主動、自助互助，盡量少依賴他人；不到非不得已，絕不依賴外界。不要把自己變成依賴的人；要以自己的腳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勇敢的面對災難。因為災難是我們本來就在面對的，面對了多少次、千百年，生活世界無日無夜都在面對災難。每次災後復健，最重要的是協力互助、集體勞動、自主生計；就像大家一起自力造屋，以密集的人力、善用自然資源，合力建屋，合力修整自己的社會社群社區，然後，每天晚上一起吃飯！」⁵⁰

對部落而言，親族和社群「一起吃飯」真有那麼重要嗎？是的！如同部落夜間燃起熊熊烈火，聚集了男女老少，或歌、或舞或傳承經驗，凝聚了共同情感和群體認同。在大夥一起「埋鍋造飯」、「吃大鍋飯」的共勞、共食、共享傳統裡，部落再生成的智慧，便悄然地蘊含其中。

49 資料來源：謝英俊於「行政院衛生署98年全國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地區健康營造觀摩會暨災難重建研習會議」中的演說。於2009年11月5-6日，高雄。

50 見高正治老師在其主持的「行政院衛生署九十八年全國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地區健康營造觀摩會暨災難重建研習會議」中的主題演說。2009年11月5-6日高雄。